

经济增长与对外投资大国地位的形成^{*}

李 辉

内容提要:本文回顾了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理论和国内对我国开展对外投资的理论文献,对我国所处的成长阶段进行了分析,得出了我国已经处于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中间的结论。通过增加相关变量,扩展了邓宁的 IDP 理论模型。并使用国际面板数据,用 PCSE 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对我国未来五年的对外投资规模进行了趋势性的预测。

关键词:经济增长 对外投资 IDP 理论

一、引 言

1998 年,中央提出“走出去”战略之后,我国企业兴起对外直接投资,2005 年,达到了 69 亿美元,延续了近几年的快速增长趋势。由于发展时间还很短,我们对其发展潜力和前景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合理解释这一现象,并初步预测其发展趋势,对于指导我们更好地制定相关政策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相关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理论(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 IDP)将经济发展和对外投资联系在一起,得到了广泛认同,在实证分析中被大量应用,是分析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经典框架。国内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还集中于介绍理论、定性分析、案例分析、政策效果的定性论述等方面,由于数据不足,进行预测的文献很少,还没有基于计量经济模型的预测分析。

本文将 IDP 理论为分析框架,深入研究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性质、构成等方面,并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分析我国在 IDP 框架中所处的位置,发现我国已经走上了成为对外投资大国的道路。最后,在系统分析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将反映外部环境、经济结构等因素的变量加进来,扩展了模型,增强了解释力,以跨国比较面板数据进行估计,获得了较好的效果,并首次基于计量经济模型预测了我国“十一五”期间对外投资规模。预计“十一五”期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达到年均 130 亿美元,到 2010 年,我国对外投资大国的地位将初步确立。

二、理论与我国对外投资现状

(一)相关理论与我国的研究进展

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或跨国公司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当时以拉美、印度、新加坡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出现对外投资,对此需要作出理论解释。较早期的理论主要包括 Wells 的小规模技术理论、Lall 的技术本地化理论、邓宁的 IDP 理论等。Wells (1983) 的小规模技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拥有可以开展跨国经营的特定比较优势,即拥有为小市场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产品在海外生产上具有优势;奉行低价营销战略。Lall (1983) 的技术本地化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主要来源于自身的技术创新和对外国进口技术的消化及改进两种途径。这两种方式能更好地适应东道国的要素价格条件和对产品品质的要求,具有特有优势。而

^{*} 李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4 级财贸经济系博士生,邮政编码:100102,电子信箱:lihuifuning @126.com。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技术进步的不可逆性使发达国家不可能再次有效地使用和转移那些由于某个产业整体采用新技术而被淘汰的旧技术,这使得发展中国家可以对成熟技术创新而形成新技术,开展对外投资。Wells 和 Lall 的研究重视从技术角度出发,在企业层面考察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特殊性,而邓宁(Dunning, 1981, 1988)的研究则从宏观层面,将对外投资和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初步建立了一个动态的分析框架,给出了一个综合性的解释,成为被广泛认可的一个理论基石。

邓宁(Dunning, 1981, 1988)运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Eclectic Theory, 或 OLI 范式, 即企业对外投资由其所具有的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所决定)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做出了解释。邓宁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倾向取决于其经济发展阶段和该国所拥有的 OLI 结构,随着一国经济增长,该国对外投资的能力逐渐具备,对外投资规模也不断扩大。根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邓宁将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属于前工业化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 400 美元以下,由于国内市场狭小,基础设施不足,劳动力缺乏教育以及商业和法律框架发展都不够,资金的流入和流出基本上都没有;第二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 400—2000 美元之间,外国直接投资开始增加,主要是针对国内消费产品和基础设施的市场寻求型,由于本土企业缺乏所有权优势,对外投资很少;第三阶段,人均 GDP 在 2000—4750 美元之间,外国直接投资仍然高于对外投资,但是由于企业开始形成自己独有的与区位相联系的优势,并开始寻求更多的途径来提高自己的所有权优势,对外投资开始增加,两者的差距开始缩小;第四阶段属于发达国家,外资流入减少,对外投资继续增加,净对外投资存量变为正值。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出现了一些新形势。新技术进步对跨国公司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改善了企业内部和企业间协作的能力,极大地缩短了产品的生命周期,促使革新和制造的速度大大加快。新技术也通过新产业的出现改变了不同国家的区位优势(Narula 和 Dunning, 2000)。这些新形势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机遇,可以充分利用新技术、通过对外投资的形式增强自己企业的优势、提升竞争力。不断丰富变化的实践为理论的演进完善提供了现实基础。Dunning, Hoessel 和 Narula(1997)对发展中国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新的对外直接投资浪潮进行了分析。他们将 80 年代初主要以阿根廷、巴西、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作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跨国公司发展的“第一波”,将 90 年代以后在新的全球化浪潮中兴起的主要以韩国和中国台湾为代表的新的发展中经济体的跨国公司作为“第二波”。“第一波”的国家基本上处于 IDP 发展的第二阶段,而“第二波”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已经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国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理论的介绍和促进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必要性、可行性、鼓励措施等方面。比如,冼国明、杨锐(1998)在 OLI 框架下,分析了在投资主导型国际分工和全球竞争的现代经济环境下,发展中国家以策略性 FDI 应战的动机。强调了动态技术累积和竞争策略对发展中国家 FDI 的意义。鲁桐(1998)介绍了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理论的发展,论证了我国开展对外投资的可能性。鲁桐、李朝明(2003)通过对温州 112 家有海外经营业务的民营企业进行问卷和实地调查,总结了我国民营企业在海外市场的选择进入方式、动机、困难障碍等特征。基本结论是:中国中小企业的国际化发展仍遵循渐进发展的模式。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学习、合作、创新始终是融为一体的,并成为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关键因素。江小涓(2001, 2006)构建了一个预测我国对外投资规模的分析框架,分别对我国“十五”时期和“十一五”时期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分析,预测了可能达到的规模和结构特点。在对外投资的动机方面,代表性的文献有康荣平、柯银斌(2002)提出的华人跨国公司的“赢得优势论”和谢柱军(2002)提出的

邓宁在上世纪 90 年代(Dunning and Narula, 1996)修订了自己的 IDP 理论,增加了一个第五阶段,用来描述全球经济中的领导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净对外投资是一个围绕零波动的变量。受不同时期经济政策和经济周期的影响,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

广义的“获得优势论”。王志乐(2004)通过调研发现,中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换取能源资源、市场份额。根据邓宁的分析,在发展中国家企业发展的特定阶段,寻求市场和资源等特定资产是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外投资的一个主要动因。因此,可以将我国目前对外投资的动因视为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初级阶段的特征。政策方面的研究主要提出我国现行政策的覆盖面、支持力度、限制等方面的缺陷(隆国强,2002)和完善管理体制、建立法律体系、提高透明度、重视人才培养以及在信贷、税收、外汇等方面的优惠政策等(鲁桐,2002)。

综上所述,我国学者对海外投资的研究主要以定性研究和基于企业调研的归纳分析为主,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动因是获取优势,据此提出建议。目前的研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是缺乏国际比较,没有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放在一起研究其共性;其次,定量分析不够,尚没有发现利用被广泛接受的 IDP 理论进行实证研究的成果。本文将弥补这两方面的不足。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轨迹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1998 年,中央提出“走出去”战略,鼓励有比较优势的各类所有制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开始迅速增长。到 2005 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了 457 亿美元。“十五”时期,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以年均 10.5% 的速度增长。

2003 年 11 月开始,商务部和国家统计局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据统计,我国 2002—2005 年各年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分别为:27 亿美元、28.5 亿美元、55 亿美元、69 亿美元。2004 年底,从存量的行业分布看,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有:贸易促进型(商务服务业 36.73%、批发零售业 17.52%)、资源寻求型(采矿业 13.29%)和市场寻求型(制造业 10.13%)等三大类。同时,中国对外投资境内主体呈现多元化特征,国有企业的比重下降。邢厚媛(2005)分析我国 2003 年对外投资的新形势发现,民营企业开始成为一支重要的对外投资力量。对比 2004 年和 2003 年,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比重从 2003 年的 43% 下降为 35%。而有限责任公司和私营公司则分别上升了 6 个和 2 个百分点,到 2004 年,有限责任公司投资所占比重已经达到 28%,而私营公司也已经达到了 12%。股份制公司和私营公司合计已经达到了 50%。

从上述特征可以看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还比较小,但非国有企业的自主性对外投资比重在迅速上升。即便排除部分大型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所具有的政府背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也具有了一定的现实基础。

三、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趋势分析

(一)我国在 IDP 中所处的阶段

这一部分分析我国在 IDP 理论中所处的阶段。一般的 IDP 经验分析模型为: $NOI_i = \alpha + \beta_1 GDP_i + \beta_2 GDP_i^2$ (I) 或 $NOI_i = \alpha + \beta_1 GDP_i + \beta_2 GDP_i^2$ (II)。其中,NOI 表示人均对外投资净存量,GDP 表示人均 GDP。我们将这两个模型应用到中国数据中,数据区间为 1980—2005 年,数据来自于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和国家统计局,使用 STATA 软件对上述两个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 2。

表 1 2004 年我国对外投资境内主体的注册类别 (%)

企业类型	2003	2004
国有企业	43	34
集体企业	2	2
股份合作企业	4	3
联营企业	1	1
有限责任企业	22	28
股份有限企业	11	10
私营企业	10	12
港澳台投资企业	2	2
外商投资企业	5	5
其他	0	3

数据来源:商务部、国家统计局,《中国对外投资公报》(2003,2004)。

表 2 模型 估计结果

模型	常数项	1	2	R^2	调整后 R^2	F 统计量
II	71.03462 ^{***}	-0.2746943 ^{***}	0.0000712 ^{***}	0.9768	0.9746	442.43 ^{***}
	8.53	-12.15	5.63			
I2	-18.4194 ^{**}	-1.38e-07 ^{***}	3.65e-14 ^{***}	0.8625	0.8494	65.87 ^{***}
	-2.66	-7.76	5.46			

注: ** , *** 分别表示在 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

图 1 绘出了我国人均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和人均 GDP 的散点图,并附加了根据模型 II 拟合曲线得到的 95% 预测置信区间。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均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的变化符合 IDP 理论的预期。即,随着经济增长和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我国吸收的 FDI 流入不断增加,人均 NOI 为负值,绝对量不断增大。自 2001 年以来 NOI 增长的趋势明显减缓,除了 2005 年以外,其它各年的数据点都落在了拟合曲线的上方,说明 NOI 绝对量的增加低于预期。2004 年和 2005 年,我国人均 GDP 分别达到了 1490 美元和 1703 美元,已经接近邓宁界定的第二和第三个阶段的分界点,UNCTAD(2006)认为中国、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全球 FDI 投资的新兴力量。虽然从人均 GDP 来看,这些国家仍较低,但是这些国家的跨国公司发展迅猛,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主力。根据 II, I2, 我国在人均 GDP 达到 1929 美元和 1506 美元的时候,达到拟合曲线的最低点。这两个推论的最低点虽然低于邓宁设定的分界点,但是和 Narula, Duning(2000)对东亚经济的分析得到的结论一致,新的全球化发展使部分国家能够充分利用机遇,更早地进入对外投资大国的队伍。和 UNCTAD(2006)的观点也一致,即虽然中国由于人口基数大,从人均 GDP 看仍处于第一阶段,但是从对外投资来看,已经处于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中间。我们的分析支持这一结论,我国已经走上成为对外投资的大国之路。

(二)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

这一部分对我国未来到 2010 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趋势作出一个初步预测。NOI 是对外直接投资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净额,其中,外国直接投资受国外因素的影响很大,考虑到 Duran 和 Ubeda(2001)提出应该在实证分析中分别对流出和流入量进行估计,我们将人均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作为估计变量。建立一个多元面板数据模型,预测我国未来 5 年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额。单纯使用人均 GDP 作为唯一的解释变量会出现误设定的错误,要更好地考察一个国家经济因素对对外投资的影响,需要加入一些经济结构因素和外部经济因素,完善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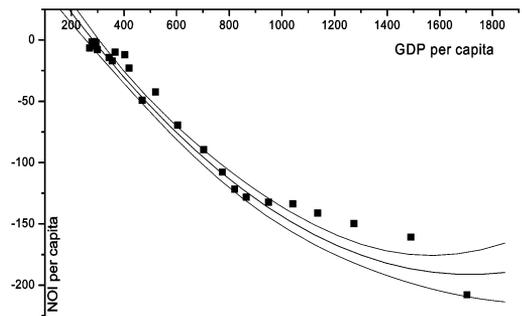


图 1 中国人均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与人均 GDP 散点图(1981—2005)

1. 影响一个国家/地区对外投资的因素与变量设定

要预测一个国家在某个时期的对外投资存量,需要从国家经济的层面考虑宏观因素。这些因素及相关变量设定如下:

(1) 国家/地区的发展阶段。这是模型主要考虑的因素,由于采用人均对外投资存量作为因变量,这里没有采用高次方程的形式,使用人均 GDP 作为衡量人均收入的指标。

(2) 国家/地区的资本积累情况。一个国家/地区自身投资能力越强,在供给能力超过国内总需求时,就越有压力去进行海外投资。而且,即便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及其他制

度方面的原因,资金在行业间流转存在障碍,因此某些部门内部可能出现资金相对过剩,为对外投资提供了资金保障。这里使用人均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该指标指生产者在一定时期内获得的固定资产减处置的固定资产的价值总额,是一个在各个国家之间具有可比性的指标。

(3) 出口。对出口和对外投资的研究大多认为,在新的经济全球化形势下,制造业和服务外包等新经济形态的发展也显示,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呈现互补的特征。制造业中间产品的贸易和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地区间配置资本是同步的。这里将一个国家/地区人均商品出口额作为变量。

(4) 结构因素。对外投资的发展是一个与经济发展相伴随的过程,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仅包括经济总量的增长,还包括经济结构的变化。因此,有必要将经济结构因素纳入考察范围。Duran 和 Ubeda (2001) 考察了制造业产出比重等结构因素,我们这里也将考察三个结构变量:政府支出、制造业产出、服务业产出占 GDP 的比重。这三个变量反映一个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因素。其中,政府支出占 GDP 比重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财政能力,考虑到自主性对外投资主要由企业作出,该变量的影响方向尚不能确定。制造业产出和服务业产出占 GDP 的比重分别用来对一国制造业和服务的相对规模进行计算。初步预计两者都对对外投资有正向影响。

(5) 外部因素。对外投资既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表现方面,也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结果。国际直接投资和全球经济形势紧密相连。国际投资很多并不仅仅服务于东道国市场,而是服务于全球市场,有必要考察全球经济变化对对外投资的影响。这里使用全球 GDP 和全球出口额。全球 GDP 表示全球宏观经济形势,全球出口额反映了全球整体的贸易环境。

面板数据中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差异是需要特别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除了上述考察变量,我们还在模型中引入了一些控制变量,分别是人口和 GDP 总额。其中人口表示国家/地区的规模,而 GDP 作为总需求反映不同国家之间总购买力的差异,用于控制国家之间差异。

2. 数据

模型采用面板数据构建。FDI、GDP 等总量和人均数据来自联合国贸发会议在线数据库 (www.unctad.org), 制造业、服务业、政府支出比重等相对指标来自世界银行在线数据库 (www.worldbank.org), 共 55 个国家和地区, 时间从 1980 年到 2004 年。全部样本国家 2003 年 GDP 总和占到了全球的 93.8%, 具有足够的代表性。其中,我们已经根据国家统计局经济普查后的数据,对我国 1993 年以后 GDP、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进行了调整。除了结构变量,其他各个变量都进行了自然对数变换。

样本国家中,北美 2 个,大洋洲 2 个,非洲 10 个,欧洲 20 个,亚洲 12 个,南美 8 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比例大约为 2:3,主要是考虑如果发达国家数量较少,样本点将会集中在人均 GDP 较低水平上。各个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系数见下面表 3、表 4。从相关系数表可以看到,人均对外投资存量、人均 GDP、人均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人均出口总额之间相关系数都很高,而全球 GDP 和全球出口总额之间的相关系数也很高。在建模时需要考虑共线性问题。

按照严格的预测要求,我们设定的变量和基于面板数据模型作预测的方法都是不够完善的,这部分是由于我国的时序变量长度还不够,部分是由于我国还是一个下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分类),有一些规律在目前阶段不会显现,必须通过将其他更高收入国家纳入模型才能获得。因此,我们下面的预测将仅用于对发展趋势的分析。

样本国家和地区为:阿尔巴尼亚,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玻利维亚,巴西,加拿大,乍得,智利,中国,中国台湾省,哥伦比亚,丹麦,厄瓜多尔,埃及,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印度,印度尼西亚,爱尔兰,意大利,日本,肯尼亚,韩国,马拉维,马来西亚,马里,毛里塔尼亚,墨西哥,摩洛哥,荷兰,新西兰,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新加坡,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泰国,突尼斯,土耳其,乌克兰,英国,美国,委内瑞拉。

表 3 描述统计量表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人均对外投资存量	1278	4.487	3.259	- 4.654	10.902
人均 GDP	1231	8.125	1.572	4.927	10.788
人均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1201	6.565	1.653	2.386	9.368
人均出口	1284	6.544	1.857	2.467	10.646
全球 GDP	1327	16.814	0.439	16.112	17.813
全球出口	1381	15.075	0.549	14.277	16.504
政府支出比重	1307	15.606	4.988	3.469	31.707
制造业产出比重	1267	18.947	7.553	2.114	48.5
服务业产出比重	1283	51.501	11.238	11.269	77.432

表 4 相关系数表

	人均对外投资存量	人均 GDP	人均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人均出口	全球 GDP	全球出口
人均对外投资存量	1					
人均 GDP	0.8888	1				
人均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0.8647	0.988	1			
人均出口	0.8774	0.9413	0.9394	1		
全球 GDP	0.2600	0.1250	0.0910	0.1554	1	
全球出口	0.2593	0.1239	0.0914	0.1594	0.9853	1

3. 模型与估计方法

本文估计模型如下：

$$FDSP_i = \alpha_i + \beta_1 \times GDP_i + \beta_2 \times X_{ji} + \beta_3 \times Z_{pi} + \epsilon_i \quad (1)$$

其中, $FDSP_i$ 代表第 i 个国家/地区的人均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GDP_i 代表第 i 个国家/地区的人均 GDP; α_i 代表各个国家相异的常数项; X_{ji} 代表各个考察变量, 即人均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人均出口、全球 GDP、全球出口、政府支出比重、制造业产出比重和服务业产出比重; Z_{pi} 代表各个控制变量, 即人口和 GDP。

本文使用 PCSE (Panel-Corrected-Standard-Errors, 面板校正标准误) 方法进行估计。Beck 和 Katz (1995) 引入的 PCSE 估计方法是面板数据模型估计方法的一个创新, 影响较大, 在估计面板数据模型的文献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面板数据有三种误差相关结构: (1) 同步相关, 即在一个给定时刻, 共同的冲击会影响所有的单位; (2) 面板数据异方差, 即不同单位之间由于特征不同而存在异方差; (3) 序列相关, 一个单位内部的序列相关性。在存在上述复杂误差结构的情况下, OLS 不是 BLUE 估计量, 常用 FGLS 方法。Beck 和 Katz (1995) 发现, 由于估计的变量过多, FGLS 方法统计特性并不好, 特别是在样本量不够大时这一问题更显著。他们提出一个更好的估计方法来处理复杂的误差结构, 得到了比 FGLS 更可靠的对标准误的估计。

假设样本包含 N 个单位, 每个单位包含 T 个时期的样本点。用 Σ 表示样本的方差 - 协方差矩阵, 矩阵元素是 σ_{ij} , 是一个 $NT \times NT$ 的矩阵, Σ 是一个 $N \times N$ 的矩阵。用 $e_{i,t}$ 表示 OLS 估计的残

差,则 可以表示为:

$$\hat{\epsilon}_{i,j} = \frac{\sum_{t=1}^T e_{i,t}e_{j,t}}{T}$$

使用方差-协方差矩阵的对角线元素来计算估计参数的标准差:

$$(X'X)^{-1} X' \hat{X} (X'X)^{-1}$$

其中, X 表示解释变量样本值的 $NT \times NT$ 矩阵。

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新的全球化浪潮的推进,各国经济通过投资、贸易等渠道相互影响的程度明显加深。本文使用的数据是 1980—2004 年,并且包含了 FDI 投资和出口等明显相关的变量,样本间应该存在同步相关性和国家数据间的异方差。我们分别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对附表模型 1 进行了估计,并对估计产生的两个残差序列进行了面板间异方差和同步相关分析。分析结果见表 5。

两个模型用来检验方差齐性的 Levene 统计量都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地异于零,说明两个模型的残差都存在异方差性;而两个模型残差矩阵的 90% 的方差都可以用前 4 个特征向量来代替,前 18 个特征向量可以表示几乎全部方差,说明残差存在很强的组间相关性。因此,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都不适合用来估计本模型,我们使用 PCSE 方法进行估计。

表 5 对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残差序列分析结果

	组间异方差: Levene 统计量	同步相关:特征根累积方差比重	
		前 4 个	前 18 个
随机效应模型	11.24 ***	90.77 %	100 %
固定效应模型	10.72 ***	90.89 %	100 %

注:Levene 统计量检验组间方差齐性,原假设是组间方差相同;同步相关采用对残差矩阵进行主成分分析的方法,能够代表绝大部分方差的主成分个数越少,各个组间同步相关性越强。

4. 估计结果与预测

(1) 模型估计结果

使用 Stata 9.1 软件中 XTPCSE 程序估计模型。自回归与异方差结构使用面板间相异 AR(1), 面板间相异异方差,并且异方差面板间相关。为了考察共线性问题,进行了多次估计,结果参见附表。模型 1 包含了全部的考察变量和控制变量,反映了各个变量的综合作用。模型 2、3、4、5、6 用于估计自变量之间共线性的影响,模型 7 考察制造业比重和服务业比重之间的可能的影响。模型 8 增加了因变量的滞后一阶变量,用于预测。

所有的 8 个模型,拟合优度都达到了 70% 以上,Wald 统计量相当于 OLS 估计中检验模型中自变量系数整体显著性的 F 统计量,在各个模型中都是显著的。总体上看,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发展中存在一些共性的规律,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邓宁的 IDP 理论具有普遍性。

在所有模型中,人均 GDP 都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显著的影响因素。由于存在共线性问题,模型 1 低估了人均 GDP 的影响大小。模型 2 表示在没有共线性问题时,人均对外投资存量对人均 GDP 的弹性是 1.433,即当人均 GDP 增长 1% 时,人均对外直接投资增长 1.433%。

人均固定资本形成与人均 GDP 具有高度相关性,而对比模型 2、3、5 可以发现,当将两个变量同时纳入模型时,人均固定资本形成的符号发生了变化,两个变量之间存在较严重的共线性问题。固定资本形成对对外投资的影响很可能是一种伴随经济增长出现的现象而不是原因。固定资本形成的影响已经被包含在经济增长因素中,可以用后者替代。出口是对外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从模型 2、4、5 可以看出,出口的部分影响被包含在经济增长中,但是,即便同时考虑经济增长的因素,出口对对外投资的影响也仍然是显著的,而且始终是正向的作用,我们的研究支持出口和对外投资是相互促进的互补关系。

全球总需求和全球贸易总量是影响对外投资的显著因素。而且从模型 5、6、7 可以看出,即便在考虑了国内因素的时候,全球因素仍然是显著的,另一方面,考虑了这两个外部因素,国内要素的系数大小和显著性都没有大的变化。外部因素是独立发生作用的。而且,两个外部因素之间存在共线性问题。比较模型 5、6、7 可知,当同时考虑两个因素时,全球贸易量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分别考虑两个因素,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全球总需求比贸易量对投资的影响更大,更能够拉动对外投资。

结构因素中,政府支出占经济总量的比重是一个显著因素,但是需要慎重对待这一结论。在我们的样本国家/地区中,发达国家/地区只有 21 个,而发展中国家/地区有 34 个。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中有很多具有政府支持背景。这可能是该指标在本模型中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原因。但是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地区往往存在市场发育不够完善,而政府的力量过大,这与促进本土企业自身竞争能力的增强可能是相矛盾的。因此,不应该根据本模型估计结果就认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应该更多地干预经济,据以发展对外投资。服务业比重比制造业比重对对外投资的影响更大。在各个模型中,服务业比重系数在各个模型中都要比制造业比重系数更加显著,而且在大多数模型中,系数数值也大于制造业比重,说明一个国家/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高更有利于本国/地区企业开展对外投资。

(2) 稳健性分析

我们采用 Stata 中的 Jackknife 方法对模型系数方差进行稳健性分析。发现 Jackknife 方法得到的标准差要大于 PCSE 方法的标准差,但是影响很小,所有参数仍然保持了原来的显著性,没有改变原来的估计结论。

(3) 对我国 2006—2010 年对外投资的预测

模型 8 增加了因变量人均对外投资存量的一年滞后值,拟合优度也从 77.85% 提高到了 99.11%。据此,我们对我国 2006—2010 年对外投资做出了预测。其中,设定 GDP 年均增长 8%,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按照 10% 的速度增长,其他各变量按照 1985—2004 年均增长速度增长。政府支出比重、制造业产出比重都设定在 2004 年的水平不变,服务业比重按照每年 0.4 个百分点的速度上升。预测结果见表 6。

表 6 对我国 2006—2010 年对外投资流量的预测(亿美元)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平均	合计
对外投资流量	95.14	110.62	128.11	147.85	170.07	130.358	651.79

根据我们的预测,我国 2006—2010 年对外直接投资将会出现较快增长。2006 年对外投资流量将达到 95 亿美元,2010 年达到 170 亿美元。五年合计约 652 亿美元,平均每年对外直接投资约 130 亿美元。

综上所述,我国正在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大国,对外投资加速增长。这意味着我国将从以吸收外资为主的阶段转向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阶段。我国企业将更多地“走出去”,利用国外的各种资源,提升自己的竞争力,这对于促进国内产业升级与经济平稳快速增长都有重要意义。同时,再就业、增长和收益分配等方面也产生了新的影响,给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今后应加强对这些新情况的研究与应对。

参考文献

- 江小涓,2001:《“十五”我国对外投资趋势研究:全球背景、投资规模与重点选择》,《管理世界》第1期。
- 江小涓,2006:《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更均衡合理地融入全球经济》,《经济研究》第3期。
- 康荣平、柯银斌,2002:《华人跨国公司的成长模式》,《管理世界》第2期。
- 隆国强,2002:《“走出去”战略的鼓励政策》,《经济研究参考》第66期。
- 鲁桐,1998:《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理论及其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第10期。
- 鲁桐,2002:《“走出去”: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跨国公司》,《求是》第10期。
- 鲁桐、李朝明,2003:《温州民营企业国际化》,《世界经济》第5期。
-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200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非金融部分)》。
-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200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非金融部分)》。
- 王志乐,2004:《走向世界的中国跨国公司》,中国商业出版社。
- 邢厚媛,2005:《海外投资:从绿地投资到跨国并购》,《WTO经济导刊》第1—2期。
- 洗国明、杨锐,1998:《技术积累、竞争策略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经济研究》第11期。
- 谢柱军,2002:《“获得优势”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探讨》,《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2期。
- Beck, Nathaniel and Jonathan N. Katz, 1995, “What To Do (and Not To Do) with Time-Series-Cross-Section Data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9, P. 634—647.
- Dunning J. H., 1981, “Explaining The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Position of Countries: Towards a Dynamic or Development Approach”,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Vol. 119: 30—64.
- Dunning J. H., 1988, *Explaining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London: Unwin Hyman.
- Dunning J. H., R. Narula., 1996, “The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 Revisited: Some Emerging Issues”, In: Narula J. D. A. R., e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Governments: Catalysts for Economic Restructuring*, London: Routledge.
- Dunning J. H., R. van Hoesel, N. Rajneesh, 1997, “Explaining The ‘New’ Wave of Outward FDI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Case of TAIWAN and Korea”,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 Duran J. J., F. Ubeda, 2001, “The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 a New Empirical Approach and Some Theoretical Issues”,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Vol. 10(No. 2).
- Lall S., 1983, *The New Multinationals: The Spread of Third World Enterprises*, London: John Wiley & Sons.
- Narula R., J. H. Dunning, 2000, “Industrial Development, Globalization an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New Realiti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28(No. 2).
- UNCTAD, 2006,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6: FDI from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 Economies: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 Wells L. T., 1983, *Third World Multinationals: The Rise of Foreign Investment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MIT Press.

Economic Growth and China's Emerging as a Main Source Country of FDI

Li Hui

(Graduate School,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Abstract: After reviewing related theories and literatures on China's outward investment,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position of China in the IDP developing phase, got the conclusion that China has been at the position between phase and phase, and expanded the IDP model through adding more related variables. With panel data, this paper estimated model using PCSE method, and made a forecast on the scale of outward investment in the near 5 years.

Key Words: Economic Growth; Outward Investment; IDP Theory

JEL Classification: O490, F210

(责任编辑:詹小洪)(校对:晓鸥)

附表 模型估计结果

模型	1	2	3	4	5	6	7	8
常数	- 25.890*** - 5.30	- 27.427*** - 4.64	- 27.3599*** - 4.27	- 24.248*** - 5.20	- 18.464*** - 6.39	- 23.043*** - 6.02	- 26.842*** - 5.17	- 2.000** - 2.34
人均 GDP	0.822*** 4.92	1.433*** 14.93			0.970*** 5.75	0.877*** 5.30	0.878*** 5.36	0.107** 2.20
人均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 0.189* - 1.73		1.105*** 12.27		- 0.265** - 2.45	- 0.211** - 1.99	- 0.190* - 1.71	- 0.047 - 1.03
人均出口	0.852*** 12.85			1.180*** 22.17	0.784*** 11.38	0.812*** 11.55	0.860*** 12.31	0.072*** 5.42
全球 GDP	1.651** 2.15	1.118 1.23	1.342 1.38	1.919*** 2.69		0.847*** 3.67	1.888** 2.30	0.288** 2.25
全球出口	- 0.696 - 1.08	- 0.052 - 0.07	- 0.046 - 0.06	- 0.896 - 1.51	0.615*** 3.19		- 0.861 - 1.24	- 0.225** - 2.08
政府支出比重	0.031** 2.45	0.033** 2.49	0.039*** 2.82	0.038*** 2.83	0.031** 2.52	0.031** 2.49	0.040*** 3.31	0.0008 0.17
制造业产出比重	0.013 1.63	0.028*** 3.18	0.021** 2.25	0.003 0.44	0.159* 1.94	0.015* 1.84	0.010 1.12	- 0.0007 - 0.21
服务业产出比重	0.022*** 4.11	0.021*** 3.27	0.030*** 4.28	0.027*** 5.70	0.026*** 4.80	0.024*** 4.42		- 0.0004 - 0.26
人口	- 0.00007 - 0.18	- 0.0009** - 2.23	- 0.002*** - 3.72	- 0.0005 - 1.31	- 0.00003 - 0.08	- 0.0001 - 0.30	- 0.0002 - 0.56	0.00008 0.78
GDP	4.02e-08 1.43	- 2.24e-08 - 0.67	9.89e-08* 1.90	1.89e-07 4.94	1.97e-08 0.68	3.06e-08 1.07	8.20e-08*** 2.73	- 4.59e-10 - 0.06
因变量滞后								0.925*** 66.30
R ²	0.7785	0.7595	0.6710	0.7299	0.7754	0.7767	0.7725	0.9911
样本容量	1168	1197	1167	1197	1168	1168	1168	1111
Wald chi2	2240.75***	1656.02***	1746.07***	2008.00***	2236.15***	2155.53***	2194.28***	1.92e+06***

注：*，**，***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